

巨匠丛书



牛犊顶橡树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尔仁尼琴选集

72



巨匠丛书

牛犊顶橡树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尔仁尼琴选集

72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 著

陈淑贤

张大本 / 译

张晓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犊顶橡树/(俄)索尔仁尼琴著;陈淑贤等译.—2版.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

(巨匠丛书/安春海总策划)

ISBN 7-5387-1178-3

I. 牛… II. ①索… ②陈… III. 索尔仁尼琴, A.I. (1918~)
—自传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015 号

全球中文版权所有 19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总代理

吉图登字 07-1998-181

总策划:安春海

封面设计:张冰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数:268 千

印张:12

印数:2000

版次:2000 年 3 月第 2 版

印次: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厂: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书号:ISBN 7-5387-1178-3/I·1130



译 者 的 话

关于这本书：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牛犊顶橡树》，是前苏联作家、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回忆录（作者称它为《文学生活随笔》）。它记述60年代初至1974年这15年间作者的主要经历、他的荣与衰、飞升和跌落。这是他从苏维埃制度下的一个“地下作家”到“英雄末日”的记录。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苏联文坛乃至政坛的风云变幻。这类作品在前苏联并不多见，作者创作的角度也颇为新颖。本书对于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前苏联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美学价值和政治历史价值。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一个有争论的人物。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联邦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939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1939年起又同时参加两年制的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1941年夏在两所

大学同时毕业。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10月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年获中尉军衔，1944年任炮兵连长，晋升为大尉。据他所在部队首长回忆，索尔仁尼琴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格，遵守纪律，完成战斗任务，曾荣获两枚勋章。

一个偶然的“不慎”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道路：在致友人信中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斯大林，信件被军事反间谍机关发现，他本人于1945年2月在柯尼希斯贝格附近被逮捕，被解回莫斯科投入卢布扬卡监狱。同年7月被判处8年劳动教养，先后在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劳改营中服刑。1953年刑满，但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索尔仁尼琴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流放。1956年苏共20大前夕，为索尔仁尼琴恢复了名誉，他被派到梁赞市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担任物理课教员。1957年迁居梁赞市，并且实际开始从事“地下”创作。1961年苏共22大以后，他决意争取作品发表，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和帮助。1962年12月，反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终于发表。从此，索尔仁尼琴从深深的水下浮出水面，成为苏联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一颗“新星”。他迅速被吸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被邀请参加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与知名人士的会见、被引荐给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被提名作列宁文学奖金的候选人等。《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还发表了他的《小品集》、《玛特辽娜一家》、《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为了事业的利益》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伴随着“解冻”时期的结

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拖延数年得不到发表的《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等作品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癌病房》等不准出版；1967年5月他致函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也未被置理。从这时起索尔仁尼琴开始把苏联文学界的生活片断记载下来，写成随笔、回忆录。这就是现在呈现给读者的《牛犊顶橡树》这部书。

索尔仁尼琴被查抄的作品由当局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印行，在一定范围内阅读。与此同时索氏的某些作品也以手抄本和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并且在国外出版。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的正式出版使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时《古拉格群岛》的微缩手稿也已送出国外。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1970年根据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的提议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索氏同意接受奖金，但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1973年《古拉格群岛》的第一部在巴黎出版，当局决心对他采取断然措施。1974年2月12日以叛国罪被拘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最初他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1974年12月去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奖金。1975年去美国，在佛蒙特州定居。此后潜心创作了多部长篇巨制如《红轮》等，陆续有作品发表，并且曾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国访问。1994年5月全家返回莫斯科定居。还有作品问世。

关于这本书的翻译：《牛犊顶橡树》一书根据1975年法国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的权威性俄文版本译出并参考了其他版本。这本书的翻译凝聚了一家两代人的心血，是一家两代俄语工作者、两代俄苏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辛勤劳作的结晶。很遗憾的是第二位译者在1996年去世于俄罗斯，没有看到此书在

中国的问世。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色，他用词丰富而奇特，犀利而深刻，笔意纵横，语言畅达，思想跳跃起伏（以至于原文中常用括号表示），翻译过程中译者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多方请教，也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译 者

1987 年 12 月译完

1997 年 12 月校订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一点说明	(1)
地下作家	(3)
初露峥嵘	(23)
浮出水面	(62)
受伤的鸟	(126)
补记之一 (1967 年 11 月)	
绞索断裂	(195)
补记之二 (1971 年 2 月)	
发 作	(225)
扼 杀	(250)
补记之三 (1973 年 12 月)	
诺贝尔奖	(275)
遭遇战	(292)
补记之四 (1974 年 6 月)	
英雄末日	(307)



一点说明

存在着一种派生文学，其数量不小。这是讨论文学的文学、围绕文学的文学、产生文学的文学（如果没有一种文学在先，也不会派生出另一种文学于后）。我因职业关系很喜欢阅读些这类文学作品，但是认为派生文学大大低于本体文学，而且这种文学作品洋洋洒洒，人们也难得有暇阅读，所以觉得：写起了回忆录，而且还是文学回忆录，不难为情吗？

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竟然会在 49 岁的时候提起笔来拼凑这部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两个情况纠合到一起，促使我这样做。

第一，我们无情而怯懦的保密性，这是我们国家一切灾难之源。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这种保密性还将持续多久，殊难预料，或许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过早地死于斧下，未来得及讲出的话也就付之东流了。

第二个情况是：绞索套在我的颈上已有两年，但还没有拉

紧。这个春日我想用生命作一次小小的冒险。是挣断绞索，还是被缢致死，也是难以预见的。

我正被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一块已经推开，在另一块巨石面前我感到卑怯，我争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我于是想到也许到了诉说一些什么的时刻了，为的是预防不测。

1967 年 4 月



地下作家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如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生活条件非常优越的作家良心受到谴责，内心也十分痛苦。

说来说去，转入地下，不担心世人了解你，或者相反，希望老天爷知道你，这是我们祖国作家的造化，是纯俄国的、俄罗斯和苏维埃的造化！现已查明，拉季谢夫在死前不久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深藏起来，藏得无比之深以至于今天还未能发现，无从了解。普希金曾经巧妙地用隐语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少有人了解恰达耶夫长时间地采用密写方法创作。他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己家大图书室的各种不同的书页里。当然，对于卢布扬卡的搜查者这样并无效果，不论有多少书，

检查人员总能从头到尾翻个遍，全都给你查出来（朋友们，不要往书里藏东西！）。然而沙皇的宪兵们竟没有发觉。恰达耶夫死去了，他的图书馆保存到革命时没有人动过，分散在各书页里不为人知的手稿一直在其中。20年代时手稿被发现，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终于在30年代由沙霍夫斯基整理完毕准备出版。然而就在这时沙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从此再没有回来）。恰达耶夫的手稿直至今日仍然秘密地存放在普希金之家（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里：不准出版这些手稿，因为……其中有反动成分！

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家作品被扼杀的记录——他逝世已经110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写了就写了，到此为止！

后来变得自由多了：俄国作家不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桌子，只要愿意全都可以出版（只是批评家和政论家还需要选用些伊索寓言式的表达方式）。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的国家结构，以致使俄国文学得以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革命之路，进行了革命。

然而，当文学跨过它自己造就的革命的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文学走进的并不是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而是一个天棚斜竖的小阁楼，四壁萧然，狭窄异常。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又经过大约10年，他们又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作家们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还没有完全丧失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作品出版的希望。

被捕之前我对此中许多奥妙全然不了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倾心于文学，并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什么需要我。只是因为很难为小说找到新鲜的题材而黯然神伤。如



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被捕之后，经过了两年监狱集中营生活，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做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我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出版著作，我今生今世也不敢想象，决不存此奢望。

于是，我摆脱了无谓的幻想。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开始写诗，后来写剧本，最后又写散文作品。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了我自己。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劳改营里我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有几万行之多。为此我想象着诗的格律音步，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劳改期届满时，我相信记忆的力量，开始写下散文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后来竟能写下并记住整个一篇散文。记忆力还真不坏！进展顺利。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背诵下的东西重复一遍，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

这时，开始流放，而且在流放之初又发现我得了癌症。

1953年的秋天，好像我是在和生命最后诀别，活不上几个月了。12月间，医生们（也是被流放的伙伴）证实我最多还能活三个星期。

我的生命，连同我在劳改营中记诵的一切全都面临毁灭的危险。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时刻：在临近解放时痼死狱中和我写作的一切（这是我在此之前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功败垂成。我深知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特点，我不能向外间的任何人呼救：快来吧，拿走吧，快来拯救我的著作！而且根本不能求助于外人。朋友们，他们都是劳改营里的犯人。母亲已经谢世。妻子又嫁了别人。我终于还是邀请她来同我再见最后一面，也许她能把手稿顺便带走。但是，她并没有来。

在医生们许给我的这最后几个礼拜，我仍不能逃避不到学校工作，可是我连续许多个夜晚，在由于疼痛而彻夜不得安眠的时候，急匆匆地，零敲碎打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我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1954年新年前夕，我去塔什干，准备在那里升天。

但是，我并没有死。（我得的是严重的恶性肿瘤，耽误了诊治，根本没有希望。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这一年春天，久病初愈，由于大难不死我如醉如痴（也许我只能再活二三年），兴奋之中写完了《劳动共和国》。这部作品我已经不再试图把它记诵下来了。这是我领略到幸福的第一本书：我不再需要刚刚背会一段就把它烧掉；写到结尾时还可以参照没有毁掉的开头；可以通读全剧；可以誊清、修改、并且再抄好。



但是，销毁旧的草稿，又怎样保存最后的定稿呢？别人的侥幸的思想和别人的侥幸的帮助引导我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应当掌握新的手艺，以使所有的手稿（包括写好的和正在写的）既不让偶然来造访的窃贼偷去，也能逃过流放地里泛泛的搜查。学校里我每周有 30 节课，还担任班主任，自己一个人做饭照料家务事（由于需要保守住写作的秘密，我不能够结婚）。已经够忙的了，地下的写作也还嫌不够，我还需要学会新的手艺——把写好的作品藏起来。

学了一种营生接着还要学另一种：自己把手稿拍成缩微胶片（没有灯光照明，只能在太阳不被云遮的条件下）。然后把缩微胶片藏进书籍封皮里，写好两个信封：美国、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托尔斯塔娅农场收。在西方我不认识什么人，连一个出版家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托尔斯泰之女不会不帮助我。

孩提时读战争故事或者地下工作者的勋绩，常常惊异不止：人们义无反顾的勇气来自何方呢？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经受住这样的磨难。30 年代读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时，我就曾经这样思考过，可是上了战场，我才确信，一切都简单得多，渐渐就会习惯，作品中描写的要比实际上可怕。

如果是冒冒失失地转入地下，红灯下，黑面罩，指天誓日，立下血书，这可能是很可怕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早已被家庭生活方式抛掷在一旁，没有基础（同时也已经没有愿望）再建立外部生活，只过着一种内在的生活，他找到一个又一个门径，东躲西藏，结识一个人，又通过这个人去结交另外一个，信中或见面时使用暗语，有时又以代号相称，还有几个人的联络网，于是乎有朝一日早晨一觉醒来时便会说：天哪，我早就不是地下工作者了！



当然，不是为了革命事业，仅仅是为了文学艺术而隐入地下，这是可悲的。

流年似水，我已经被解除流放，获得了自由，迁居俄罗斯中部，结了婚，恢复了名誉，过着相安无事而又卑微屈从的生活，但是对于我已经非常习惯，就如同是习惯了表面的学校生活的地下文学的背面生活一样。任何一个问题：为哪一个编辑部赶写的作品？大约在什么时候写完？印刷多少册？要印多大开本？使用什么机器？印好的书以后放到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像一个从容呼吸的作家那样来解决的——他们只求印完书，欣赏一番，随即走开了；还是地下工作者的那种永远紧张不安的盘算：这些书怎样保存？保存在哪里，用什么工具转运？写好和印好的东西逐渐增加，体积越来越大，应当想办法找些新的储存地点呢！

物品的体积确实最要紧，不是指创作手稿有多大，而是有多少立方厘米。一系列的因素帮助我摆脱了困境：视力还没有损坏，生就的一手小字（能写得如同葱籽一般），很薄很薄的纸（如果能从莫斯科弄来的话），把草稿、计划、未定稿全都消灭（我总是只作一件事：付之一炬），写得密密层层，行距很小，不留页边，而且是正反面全都写满，重写之后原来的清稿也要焚毁：从在监狱里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我只承认火最可靠。按照这样的程序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一圈》、剧本《坦克了解真情》，这里还不包括早期的一些作品。^①

① 把剧本的原稿烧掉我心得流下了眼泪，它是用特殊方法写成的，但是在一个恐怖的夜晚我不得不把它投入火中。梁赞市的住所是靠火炉取暖的，这就方便多了，如果是暖气住房，要把书稿付之一炬就会忙乱得不可开交。

——作者原注



所有这些防范措施当然都是因为事怕万一，然而上帝保护小心人。安全委员会的人无缘无故就来造访我家的情况绝无仅有而且不可思议，虽然我是一个劳改营分子，可是劳改营分子又何止万千呢！^①而现在还是一句谚语在起作用：

“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

我必须在生活中采取一切办法使自己更安全些。我不久前迁居梁赞，在这里没有任何熟人和朋友，家里既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不出去做客，因为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年年月月，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日，没有一点儿闲暇时间。不能让隐藏的原子从住所里跑出去，连一时一刻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关注的目光。妻子严格地信守这项制度，我对此评价很高。工作中身处同事中间从来不表现出自己有广泛的兴趣，而是总装作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所有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贪婪心理，有时候虽然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告和当仁不让的反诉澄清某些事情、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事，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永远心安理得。

俗话说：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身处逆境才能够穷而后工。

这是非常不易的！似乎流放并未结束，劳改营的生活并没

^①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前来造访，处在当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等待我的起码是死亡。读者如果有机会读到我的《第一圈》原稿的全文（96章）肯定会确信这一点。